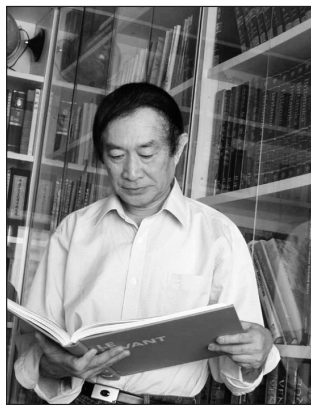


我的建筑人生

○王瑞珠（1963届建筑）

王瑞珠，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63—1970年在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1970—1984年任职于国家建委一局，1981—1984年，公派赴法国巴黎建筑学院（UPA6）进修。1984年至今，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学术顾问。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瑞珠
学长

湘江

1940年4月，我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父亲原籍山西，是个毕业于北洋大学的机械工程师，母亲则出身于天津一个官僚世家。当时，衡阳正面临着日寇进攻的严重威胁。在一次空袭中，怀着我的母亲因为躲在一张结实的桌子下才幸免于难。童年时代的我，只记得全家跟着父亲在战乱中到处奔波，从湖南入广西、进四川，抗战胜利后，又辗转到东北，直至到北平后，才暂时安定下来。这时我已经七八岁了，还从没有上过学。仗着受过良好师范教育的母亲那点“家教”，斗胆插班上了三年级。但没上多久，学校生活还没完全适应，全家又随在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南下。不知是巧合还是缘分，刚好又回到我的出生地衡阳。衡阳是当时粤汉铁路总局的所在地，铁路职工子弟小学和中学都在这里。趁这次转学和解放后重新编班上课的机会，我又连续跳班上了五年级。怕我跟不上，长我10岁的姐姐当仁不让地代

替母亲担起监督的重任，当时我心里也没底，只得在她的督促下老老实实“认真”了一把。没想到，期末发榜我竟然得了班上的第一名。

其实，对名次我倒并不太在意，这次经历只是使我认识到，只要努力，许多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此后，学校转入正轨，我也按部就班，从小学升入中学。当时的衡铁一中，和年轻的共和国一样正处在上升时期，充满了朝气，教育水平和质量在湖南省都名列前茅。正是在这个位于湘江东岸山坡上的学校里，我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代。

清华园

1957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迈出了决定我今后人生的第一步。1957年的高考形势相当严峻，受当时的政治气候影响，全国的录取名额一下子压缩到10.7万人。当时我之所以填报建筑

□ 值年园地

系，主要因为它是清华唯一的六年制专业。打开清华的招生介绍材料，第一个就是建筑系（其他系是以后改为六年的）。上建筑系要加试美术，这对于从小喜欢画画的我也算是个优势。同时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是考虑到自己的家庭背景。高中几年，我虽是班干部，但由于有所谓“海外关系”，一直未能入团，所以未敢报像“工程物理”这样的敏感专业。

对我这个来自湘江边上的17岁青年来说，清华曾是那样的遥远、那样的神圣。而如今，她就在我眼前。大礼堂、二校门、清华学堂，这些朴实无华的建筑，连同它们之间的那片草地和背后缓缓流淌的小河，这就是学子心中的圣地——清华！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清华，并不是“世外桃源”。“反右”“红专辩论”“大跃进”……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不断冲击着正常的教学活动，然而清华的优良学风和传统并没有因此丢失。当时的建筑系馆就设在清华学堂，精美的曲线大楼梯和宽敞的廊道上，陈列着大卫的雕像、各式斗拱和爱奥尼柱头，资料室的墙上挂着大幅的水墨渲染图，处处昭示着这是一座艺术的殿堂。

第一天晚上去图书馆，推开阅览室沉重的大门，眼前的一幕使我惊呆了：明亮的日光灯下，望不到尽头的一排排桌台前，坐满了埋头研读的青年学子，桌上堆满了书籍、笔记本和计算尺等用具，整个大厅安静得似乎掉一根针在地上都能听得见。那晚，我终究未敢进去，生怕打扰了里面的宁静气氛。

从那以后，图书馆就成为我经常的去处。在那里，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看

似和专业无关的杂书，包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比格尔号旅行记》，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等。不过，在这期间，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还是艾芙·居里所写的那本有关她母亲的著名传记。其中的一段话令我终生难忘：“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东西比支配宇宙的不变定律更为迷人？还有什么东西比发现这些定律的人类智力更为神异？……和它们比起来，小说显得多么空虚，神话显得多么缺乏想象力啊！”

科学家在探讨客观规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勇气，特别是他们所采用的那种实证方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产生的结果更是令人神往。我不由地想到，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检测人类建筑活动的现象和历史呢？如能通过探求它的本原，于错综复杂的现象世界中找出不变的法则，并由此寻得新建筑的方向，岂不是同样美妙？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鼓舞和驱使下，我开始对建筑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有意识地转向这方面的研究。

很快建筑史这门学科就以它那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了我。课堂上老师讲的那些内容已不能满足需要，而有关的外文资料绝大部分都是俄语，为此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恶补”此前不感兴趣的俄文。系图书馆里那几卷苏联建筑科学院编写的大部头建筑通史遂成为我的主要知识来源。人类几千年的建筑遗存，一个又一个的建筑奇迹，就这样在我眼前逐一显现。当时的感受就好像冒险踏进了一个神秘的原始森林，每深入一步都能发现新奇的风景。

不久我就意识到，建筑虽是人类最古老的活动领域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但用其他实证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在理论认识上只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这一“重大发现”令我无限兴奋，它激起了我心中的强烈愿望，要向这一未知领域前进。

现在回忆起来，应该说从20岁到22岁这两三年期间，是我思想最活跃、最敏锐的时期，也是在学术研究这块园地上收获最大和人生最快乐时光。在当时建筑系的学生中，我这种表现大概颇为“另类”。当大部分同学都把时间花在设计这门主课上，在专业教室里挑灯夜战时，我却早早结束战斗，钻进了图书馆。那里是我的天堂，我的圣地。在那里，我可以思想自由驰骋，终日沉浸在追求的幸福中；在那里，每天我都有新的收获、新的发现，有新的兴奋点相伴。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各地建筑发展的图景开始在头脑中逐渐成形，各时期建筑演变的线索也越来越清晰，同时又不断有新的问题和疑惑出现，吸引着我继续前行。到1962年底，在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我终能将一本16万字的论著《建筑理论原理》（初稿）交到此前听过我“宏论”的一位同班好友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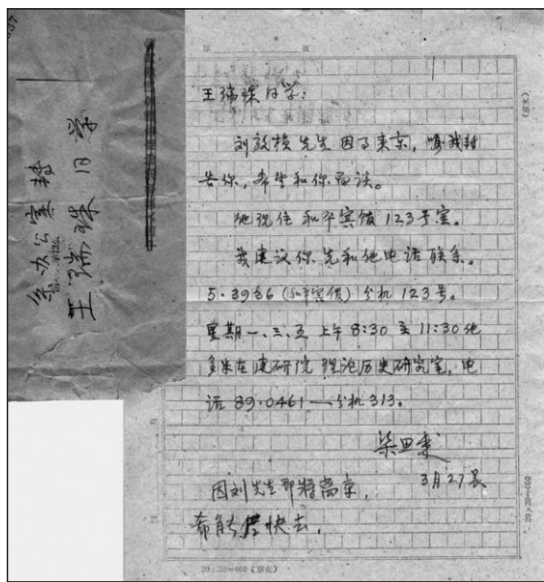
在清华的这几年，构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它不仅确立了我今后的科研方向（尽管只是形成了一个大的框架，许多细节还有待深入），同时也奠定了我的人生道路和价值取向。

大学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毕业前，我突然收到系办公室转来的一封梁思成先生的亲笔信，让我尽快到北京和平宾馆找刘敦桢先生。刘先生找我，显然是因为我报考了他

的研究生。按现在的说法，应该算是进入面试阶段了。作为学生，本应多听些先生的教导，但我当时年轻气盛，谈话间竟和先生争执起来。争论的内容已记不真切，大体是先生比较强调文献考据，而我偏重实物考察和理论思考。最后的结果是否与这次见面有直接关系，由于先生已经作古，不好妄加揣测。多年后，我与同班王天锡谈及此事，他觉得我大可不必如此，即使心中有不同看法，也犯不着当时就意见相左。我明白天锡的好意，但现在看来，没有上研究生未必是坏事，否则研究生毕业时正赶上“文革”期间大分配，“臭老九”被发配到哪里真不好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磨难

毕业后，我如愿被分配到原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在我充满信心前去建研院



1963年毕业前夕，梁思成写给王瑞珠的信件

□ 值年园地

报到的时候，前程似乎是一片光明，鲜花似锦。可是，我哪能想到，实际上要到17年之后，我才能再度拨转人生的航船，驶向梦寐以求的那片圣土；而全力投入这件工作，则要到整整30年之后！

这30年，正是人生精力最充沛的阶段，下放劳动，“四清”运动，设计革命，在不断的机构变动中，学建筑的人在建筑科学院里已无容身之地，更不要说从事理论与历史研究了。在接下来的“史无前例”年代，经过批判和被批判、审查和被审查一番折腾之后，“臭老九”统统下放到“五七干校”，然后又被分配到全国各地。

我和妻子举家迁到湖北“大三线”的山沟里，在队组里从小工干起。脚手架上运砂浆，高铁塔上刷油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充分发挥着身强力壮的专长，还要时不时接受批判。随着时光的流失，青年时代的理想，变得越来越遥远，几乎幻化成不可能实现的梦；然而在心底深处，希望却未曾泯灭，似乎是应了哪位诗人的话：我们生活在受难的底层，但总有人不忘抬头，仰望星空……

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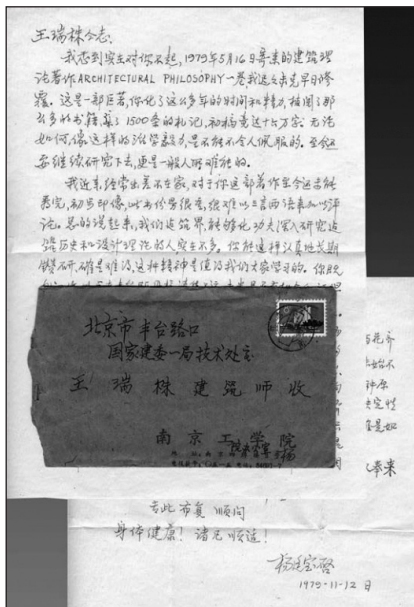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希望的曙光终于出现。1980年，第二批国家公派留学人员选拔通知下到我所在的建委一局，其中有一个去法国的名额。

人生能有几回搏？我决定一试。就这样，在持续了17年的低沉之后，我终于开始迈出了决定人生道路的又一步。初试通过，接着是政审、体检、业务考核。最后在10月份举行的全国外语统考中，在北京语言学院考点，我以法语第一名的成绩出

线。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留学的大门终于向我缓缓敞开。

在确定留学的研究方向上，还要特别提到杨廷宝先生的一封信。那是1979年，我将大学论文的缩写本寄了一份给先生求教。他不仅回信给予鼓励，还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令我非常感动。没想到这封信在1981年部专家组审定我出国研究方向上竟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使我回国后可以名正言顺地调离原来的工作单位。

命运的转折是那样突然，当巨大的波音747腾空而起的时候，我还难以相信这一切都是现实。飞机在夜空中缓缓爬升，泪水逐渐模糊了视线：再见了，祖国，这生我养我的土地；再见了，日夜相伴的亲人！我闭上眼睛，仰倒在座位上，却难以入眠：想想吧，在飞机的那一头，是法国，是巴黎！是百科全书派学者的故乡，笛卡尔和巴斯德的祖国，居里夫人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



一九七九年，杨廷宝先生给王瑞株的回信

大巴载着我们驰入巴黎市区。“城岛，巴黎圣母院！协和广场！”看到那些谙熟于心的景色，我禁不住喊出声来。同行的几位留学生惊奇地转过头来：“你来过这里？”“不……”我低下头，颇有点不好意思：“没有，只是书本上看过。”

巴黎，在我们这些刚刚经历了“文革”噩梦的人面前，不啻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听到各种观点，欣赏各种流派的艺术，也可以自由发表各种见解，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你的看法，都不会对之进行干预。在城区漫步，你能强烈感受到在她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栋建筑，乃至每一块石头中传递出来的文化信息。

1982年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巴黎老拉丁区的学院路。从我的住地到巴黎圣母院所在的城岛，不过几分钟路程。住地一侧的法兰西学院是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是和居维叶、安培、米什莱、商博良等伟大学者的名字相联系的学术圣地。我常在傍晚，沿着屋后一条向上坡起的小巷，到万神殿所在的小广场上去散步。广场上有卢梭和高乃依的雕像，使人们记起法国在哲学和文学上的伟大成就。旁边的圣热内维也芙图书馆曾是当年那个穷学生玛丽·居里刻苦自修的地方。每天晚上，她都“坐在一张长方形大桌子前面，手抱着头，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钟图书馆关门的时候才走”。在图书馆那沉重而古老的大门上，一张朴素的卡片载明，至今这里仍是晚上10点关门。神奇的传统！

巴黎美术学院是近代西方（包括美国）建筑教育的策源地。1968年后，建筑专业从这个位于塞纳河畔的著名建筑中分离出来，组成许多小的学院（UPA），



王瑞珠学长在法国巴黎

但各学院仍属美院系统。我所在的UPA6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由于传统上把建筑和雕塑、绘画并列，一律视为“艺术”，因此没有设学位制。这对我倒是一个有利因素，这样我就不必在论文写作和繁琐的文献考证上下太多的功夫，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对各国进行实地考察。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有计划地大量考察真实的古迹。那些以往只有从书本和图片上才能看到的建筑，如今都真真切切地展现在眼前。建筑是空间艺术，生动的文学描述、逼真的摄影记录，甚至是音像俱全的影片和电视，都无法替代现实环境的真实感受。

正是在国外进修的这段期间，我对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包括非洲、小亚细亚地区十几个国家，160多个历史名城和地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及研究。其中对埃及尼罗河沿岸古代建筑遗址的考察、对爱琴文化遗址的考察、对希腊本土和小亚细亚沿岸希腊化时期遗址的考察、对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古迹的考察，以及对西班牙境内各主要古迹的考察等，都是我国建筑学者以前很少进行过系统的现场研究，甚至是很少涉足的地方。这几年的考

□ 值年园地

察和积累，为我以后的工作和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外的这几年，构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尽管每天都超负荷工作12小时以上，特别是在各地考察时，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甚至为了赶时间在火车站的长凳上过夜，体重也从出国时的65公斤降到51公斤。然而，与每天能享受到的幸福相比，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面对如此丰厚的回报，就连以前所受的那些磨难和挣扎，也都觉得是值得的了。

使命

1984年初，我如期返回日夜思念的祖国。在一番奔波之后，调入现在的工作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80年代末，我有机会参与了介绍国外建筑和文物建筑保护经验的大型电影系列片的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项目）。相关素材被剪辑成《欧洲建筑》等八集影片，1990年开始公演，次年在中央电视一、二台黄金时段连续播出，在普及宣传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欧洲古建保护》一片还获得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政府奖）。1993年，我的第一部专著《国外历史环境的保护和规划》正式出版并获得建设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就这样，在经过了将近十年的酝酿和前期准备后，1994年，“世界建筑（含城市）史”课题终获建设部批准立项。在大学毕业30年后，我终于能在一个理想的宽松环境里，去一步步实现青年时代的理想。

2003年，我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然而我心里明白，对我来说，事业只是处在起步阶段，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面。在向工程院学部大会进行陈述时，我

着重说明：“近代建筑史学，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的建筑史学，从18世纪兴起以来，几乎一直为西方学者所垄断。在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取得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完成一部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和建筑通史，曾是我国建筑和城市规划工作者，包括老一辈学者在内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望。”正是本着这样的初衷，丛书的规模曾几经调整扩大，从最初的8卷扩大到18卷50分册，重点是增加亚洲部分，特别是以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为代表的东亚建筑的比重。随着规模的扩大，完成的时限也从最初的不到十年延伸到几十年，可谓长路漫漫。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个艰巨的任务和巨大的挑战。

目前，这套丛书已出版了15卷39分册，还有一卷（4分册）即将交稿。2003年，在向工程院学部汇报自己的工作业绩时，我坦言，我的工作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建筑理论、城市和建筑史、历史环境的保护和规划；就重要性而言，是自前向后；但在实际工作的业绩表现上，却是自后向前。这部史书的编纂，当属其中的第二部分。在这部分完成后，我还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完成几部专著。但从大学毕业到这个课题正式立项经过了30来年；这第二阶段的工作，又耗去了我的第二个30年。已年逾80的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时间的紧迫。我们这一代人，被耽误的时间太久，我不知道在有生之年能否完成既定的目标，更不知道后人对这些工作将如何评价。我现在能做的，只是尽量把握住今天，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只希望，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回首往事时能够无愧地说，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